

广东经济出版社

葡国撤退前的澳门

冯邦彦 著

101
你可知 Macau 是中国的？
我告诉你她又多了我！
但愿你能够记得我的肉体：
你曾在这座城市的无垠：
三声自是，我忘不了的母亲啊，
澳门啊，你是我一声真名：
你啊，母亲，我常回来！
你啊，母亲，我常回来！
母亲啊，母亲，我永远回来！
——
闻一多



前 言

199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还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9年12月20日,澳门将继续香港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第二站。

随着回归步伐的日渐迫近,澳门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注视的焦点。近日,欧洲联盟副主席布里坦就表示,“一国两制”构想将使澳门持久繁荣,澳门将继续成为欧盟的优先合作伙伴;在回归的这个转折时刻,欧盟期待与澳门的合作成为支持“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因素。而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近期其驻港领事馆亦加强了对澳门社会状况和与欧盟关系的研究与探讨,澳门的角色对一向与美国关系密切,但极希望通过中间角色发展与欧盟关系的日本极有潜在价值。

随着回归步伐的日渐迫近,一个空前的“澳门热”正在中国大地掀起。澳门,这个中国的南大门、毗邻香港的“东方蒙地卡罗”正成为人们关注、探究的热点。对于内地绝大多数的中国同胞来说,澳门和香港一样,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领土中被外国管治的地区,它们同属海岛型经济体系,都实行自由港政策,简单而低税率的税制,两地之间存在不少相同之处。因此,它们通常被内地合称为“港澳地区”。然而,两地之间其实差别很大,就体积而言,1997年澳门人口为42.2万人,土地面积21.45平方公里,仅分别是香港的6.5%和2.0%;以当年价格计算,199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584.7亿澳门元,折算为港元仅为香港的5.3%。就比较优势来看,香港的优势是全面的,不过,澳门亦有其独特的优势。双方的

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香港是国际著名的商业大都会、现代化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澳门则主要是区域性的旅游博彩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后勤服务基地，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国际化程度不高。

2. 香港是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货币金融体系已较健全、完整，金融市场发达，金融工具众多，外汇储备雄厚，财政稳健；而澳门的货币金融体系相对较薄弱、单一，对香港的依赖性强。

3. 香港凭借着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的优势，充分发挥自由港的功能，是中国内地乃至亚太区最重要的贸易转口港，与国际市场保持着极密切的商业、贸易、航运联系；而澳门则因缺乏深水港，其自由港的优势长期无法发挥，必须借助香港为中转港。

4. 香港和澳门的国际联系面各有侧重，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联系是全球性的，但侧重美、日、欧洲及东南亚；而澳门则因与葡萄牙的关系，其国际联系面侧重于欧盟、拉丁语系国家以及东南亚，有其特定的潜在优势。

5. 香港与澳门的经济均已转向服务经济，但香港的经济结构仍呈多元化，金融、贸易、地产、旅游以及资讯业等均较发达；而澳门的经济结构则相对较单一，1997 年仅旅游博彩业在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高达 45%，正如美国麦健士公司的研究报告所指出，澳门经济结构呈现出“极性”的特点。

6. 与香港相比，澳门开埠的历史更悠久，它在历史上曾是中西文化、宗教长期交汇的城市，具有“博物馆”式的都市风貌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生活节奏快速的香港比较，澳门弥漫着“欧陆小镇”的悠闲情调。而且，澳门的博彩业早已闻名于世，享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长期以来都是周边地区的博彩旅游胜地。因此，澳门更具有发展旅游博彩业的优势。

7. 与营商成本相当高昂的香港相比，澳门具有低成本的优势。

据估计,澳门的生活费用只是香港的40%左右,地价和租金约为香港的17%,雇员的工资也只是香港的40%左右,澳门还有一套比较灵活的劳工输入制度。

8. 香港与华南地区经济的合作和融合程度较高,经过20年的发展,双方已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香港在整个区域分工格局中处于商业大都会和服务中心的战略地位;而澳门与毗邻的珠海,在进入90年代以来反而逐步突显其竞争性。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澳门经济体积细小,特别是缺乏深水港,无法与其背后的经济腹地,尤其是珠海、珠江三角洲西部以及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联系。不过,自从1995年底澳门国际机场落成启用后,情况已开始改善,澳门作为台湾与中国内地的中转站的角色开始突显。

9. 香港自70年代以来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政府行政架构和公务员制度,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公务员队伍;而澳门在葡国的管治下,引进了一套葡式政制和公共行政架构,中高级公务员本地化进展迟缓。因此,澳门现行政制仍存在着行政效率低下等不少问题。

10. 香港已形成现代化法制和法治环境,其经济方面的法律适应香港作为现代商业大都会的发展;而澳门则实行源自葡国的大陆法体系,其经济方面的法律仍滞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环境尚未最终形成。

11. 香港在过渡时期,在种种原因的推动下,已初步形成政党政治的趋势,政党政治的影响力正逐步上升;而澳门社会的特色则是社团政治,其中,中总、工总、街总等新中社团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12. 与香港相比,澳门市民对国家、民族的观念似乎更浓厚,在对待回归问题上,香港部分市民曾持疑虑的心意,而澳门市民则普遍持期待心态,希望回归成为澳门政治、经济进入一个新时期的转

折点。

本书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撰写的。全书共分四篇 16 章。第一篇“东方蒙地卡罗”，共 6 章，在回顾澳门经济逾 40 年间“随波逐流”式演变的基础上，分别剖析了澳门经济四大产业——旅游博彩业、出口加工业、地产建筑业和金融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并分析了澳门投资环境的优劣和资本结构的基本特点。第二篇“葡治中国领土”，共两章，介绍了澳门的葡式政制和大陆法渊源的法律体系，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第三篇“中西交汇第一门”，共 4 章，分别介绍了澳门“博物馆”式的都市风貌、中西合璧的文化宗教、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第四篇“一国两制第二站”，共 4 章，回顾了澳门问题的由来，剖析了澳门九九回归祖国的历程。

本书介绍了葡萄牙撤退前澳门的经济、政治、法律以及社会文化，重点则是从诸方面围绕澳门的投资环境和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一主线而展开论述的，最后提出笔者对澳门经济未来发展路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有识之士。

本书能够在 1999 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出版，首先要感谢广东经济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李远谋先生；同时，还要感谢为本书的完成提供大量宝贵资料、图片及各种协助的澳门各界朋友。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帮助，本书实难以顺利完成。他们是：澳门旅游司副司长雪苏丝博士、澳门旅游司谢庆茜厅长、澳门新闻司何慧卿厅长、澳门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委员吴志良博士、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本立先生、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秘书处主任高展鸿先生、胜生企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维特先生、萧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萧志伟先生、大西洋银行海外市场事务总经理苏励志博士、大西洋银行澳门分行总经理苏钰龙先生、大丰银行常务董事陆永根先生、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高级经理刘泽光先生、澳门中国旅行社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曾泽瑶先生、澳门基金会顾问冯少荣先生、《澳门资

讯》总编辑刘达求先生、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守信博士。此外,澳门旅游司、澳门新闻司、澳门文化司署、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澳门基金会、澳门海岛市政厅、澳门历史档案室、何东图书馆、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经济学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土生协会、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大西洋银行、大丰银行、汇业财经集团、澳门中国旅行社、中国保险有限公司澳门分公司、澳门电信有限公司、澳门宝法德玩具有限公司、胜生企业有限公司、《澳门日报》、《华侨报》、《澳门杂志》、《澳门资讯》等机构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各种协助,在此一并鸣谢。

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其中定有不少疵误和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冯邦彦谨识

1999年3月4日

第一篇 东方蒙地卡罗

“澳门已处于其发展的转折点。一直采取的‘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迄今已走到尽头,已能看到一些重大的、结构性的不利情况影响澳门经济。然而,在作出了发展澳门基础设施的承诺之后,澳门有机会重新确定其发展方向,因此必须充分发掘这一重大转折时期所赋予的潜势。”

——美国麦健士公司

第 1 章

随波逐流的微型经济

澳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珠江口西岸,西与广东省珠海市湾仔镇一衣带水,北藉古老砂堤与珠海市的拱北相连,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距离仅约 42 海里,南面则濒临浩瀚的南海,位居东北亚和东南亚航线的中继站。

澳门,古称濠镜、濠镜澳、濠江,包括澳门半岛及南面的凼仔岛和路环岛,19 世纪初人口约 2 万人,土地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即使经过近 1 个世纪的发展,到现在,人口亦不过 454,607 万人,土地面积 23.5 平方公里,经济体积属典型的微型经济。澳门自 1535 年开埠以来的数百年间,其经济因外部环境的转变而大起大落,呈现出“随波逐流”式的发展态势。大体而言,澳门经济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535 年澳门开埠至鸦片战争前夕。在约 300 年期间,澳门经济虽几经兴衰交替,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在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前期的约 100 年间,它一直是远东最繁盛的商埠之一,是沟通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枢纽,这是澳门转口贸易的全盛时期。

第二阶段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香港的崛起,澳门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一蹶不振。1847 年,澳葡当局宣布赌博合法化,澳门作为东方第一赌城,畸形

地繁荣起来,成为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地卡罗齐名的赌埠,号称“东方蒙地卡罗”。

第三阶段从 60 年代初期到现在,是澳门经济现代化、多元化的发展时期。1961 年,葡萄牙颁布法令,指定澳门为旅游区,特许开设博彩娱乐业,古老传统的赌业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旅游博彩业。60 年代以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香港的厂商利用澳门的纺织品配额和普惠制待遇,纷纷到澳门投资设厂,推动了澳门以纺织、成衣为主体的出口加工业的兴起,逐渐形成澳门以旅游博彩业为主导,出口加工业、地产建筑业和银行保险业为主要产业支柱的经济结构。

然而,自 1993 年开始,受到外部和内部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澳门经济结束了持续 3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步入艰难的调整期。1997 年中,亚洲金融风暴骤起,香港及外围地区饱受蹂躏,加深了澳门经济的衰退,其发展前景正引人关注。

1.1 远东最繁荣的商埠之一(1535 ~ 1840 年)

根据澳葡政府的官方资料,澳门开埠于 1557 年^①,该年葡萄牙人获准确认先前有关定居澳门的协议,正式取得澳门居留权。葡萄牙史学者施白蒂在《澳门编年史》中亦认为:“这一日期,原则上被视为澳门的形成日期。”^②然而,中国的史学者多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澳门的开埠应始于 1535 年,标志是該年专责管理外商船、主持贸易事务的官方机构——市舶司,从电白转移到澳门,澳门开始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

□澳门开埠的历史背景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西欧各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向外扩张。当时,位居大西洋沿岸地中海西口的欧洲

小国葡萄牙,凭藉其所掌握的丰富航海技术和造船经验,一跃而成为海上强国,开始向东方远征。1486年,葡萄牙人巴多路蒙·迪亚士率领探险队抵达非洲南端的海角,欣喜若狂地将它命名为“好望角”,意即可以望到富庶的黄金、香料产地印度等东方国家。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首次抵达印度加尔齐答,开辟了联结东西方的新航线。

达·伽马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葡萄牙称霸东方的野心。大批葡萄牙商人、贵族和航海者纷纷涌向印度,建立了许多居留地和商馆。1508年,葡萄牙的东方殖民总督率领一支庞大舰队击败了先于他们到达印度的阿拉伯人,一举奠定了葡萄牙在印度洋长达100年的海上霸权。

1510年和1511年,葡萄牙先后占领了印度西海岸重镇果阿和扼东西航道要冲的马六甲,作为进一步向东方扩张的策略性据点。1513年,葡萄牙人欧维士从马六甲出发,航行到中国珠江口外的屯门岛,成为第一位航行到中国海域的欧洲人。至此,通往中国的航道已被开通。

随后,葡萄牙立即展开对中国的远征和贸易扩张活动。1514年,葡萄牙人皮来资根据航海家欧维士提供的情况,在马六甲完成《东方游记》一书,这是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欧洲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书中,皮来资写道:“中国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拥有极多的土地和人民,还有许多城市和塞堡。附近各国每隔若干年便派遣使者,带着最珍贵的东西前去送礼,但均可获得比礼品价值多一倍的还礼。广州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但是只有带着中国发出的证件才能在此贸易,否则只能在离广州30里的屯门等岛屿停泊和贸易。中国有1000多艘商船。但中国人懦弱非常,易于制服。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舰,就能从海岸攫取全中国。”

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遣比利·安拉得和特使皮来资率领8



1: 半下印当是进重
纪上笔东, 仍商的
世纪家澳门, 外商的
世画澳公澳门外国
叶的度时欧美中户。
要



图 2:
20 世纪 50
年代的澳门
南湾, 充满
欧陆小镇的
风情。



图 3:
20 世纪 60
年代繁忙的
澳门内港, 仍
当时内港对
是澳门对外
联系的重要
港口。

艘军舰前往中国,要求与明朝政府建立通商关系。安拉得率领的舰队抵达珠江口外,即在屯门岛强行登陆,修筑防御工事,建立军事据点。而皮来资使团因贿赂秉权大臣和太监,于1520年获准进入北京,拜见明武帝。同年底,马六甲国向明朝政府求援的使者到达北京,向明武帝陈述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的经过,明武帝大怒,驱逐皮来资使团并下令囚禁皮来资。

1521年,在屯门盘踞长达4年之久的葡萄牙人,因肆意妄为,终于激起民愤,导致中葡“屯门之战”的爆发。广东海道副使汪鉉率守军围剿屯门,经数月激战,终于将葡萄牙人赶出屯门一带海域。

中葡战争之后,明政府重申严格的海禁令,并以“倭寇猖獗”为由,将闽、浙两地管理外国商船、主持贸易事务的官方机构市舶司撤销,又将广州市舶司迁移到偏僻的高州府电白县,使原来趋于活跃的海外贸易一度陷于停顿。

然而,到30年代,海禁再度放松,各国商船又纷纷聚集到香山、东莞、新宁等地各处港口,尤其是浪白澳。不过,浪白澳“水土甚恶,难以久驻”,作为港口并不理想。其时,澳门(当时称为“濠镜澳”)已逐渐成为中外贸易的互市地点之一,每年夏秋之间,外国商船乘风而至,守澳官员亦令其搭棚栖息,待船舶出洋才予撤除。1535年,广东前山都指挥黄庆,接受“番人”贿赂,向上司禀报获准将市舶司从电白迁移到澳门,每年由外国商船缴纳进出港口税银二万两。^③自此,澳门正式开埠,成为明朝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港口。

葡萄牙人自屯门一役受到重挫后,大部分流窜到闽浙沿海,继续进行非法贸易活动,少部分仍留在广东上川岛、下川岛和浪白澳一带。澳门开埠当年,葡萄牙人即取得在澳门停泊船只、进行贸易的权利,但仍然不能在澳门居留,他们在澳门的交易一完,就需回到浪白澳。

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商船触礁,货物被海水浸湿,要求在澳门借地方晾晒。他们贿赂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终于取得了澳门的暂时居留权。葡萄牙人登上澳门后,起初在南湾沿岸一带搭建简陋的茅寮,后来逐步修筑砖石结构的房屋,数年之间,聚落成村。^④葡萄牙人最终取得澳门的居留权一般认为是1557年,条件是需每年缴纳地租500两银。葡萄牙人诺埃尔著的《葡萄牙史》就记载:“1557年,澳门这个中国南方的半岛被租用了,成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天朝的唯一立足点。”自此,澳门港渐兴,并取代其他各口岸成为中国与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通商的主要港口。明史就有记载:“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藪点。”^⑤

□澳门转口贸易的全盛时期

葡萄牙定居澳门后,立即反客为主,以澳门为基地和中转站,积极推动东西方贸易,各国商人亦逐渐汇聚澳门,发展对中国的转口贸易。澳门很快从南海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大口岸广州的外港,成为远东最繁荣的商埠之一。直至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尤其是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澳门的转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澳门成为联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海上丝路贸易大循环的枢纽,这一大循环以澳门为中心,以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为腹地,以丝绸为大宗商品,形成了三条国际性贸易航线,即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澳门,澳门——日本长崎,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航线(见图1.1)。

首先开通的是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澳门航线。这条航线从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好望角,途径果阿、马六甲到达澳门,全程逾万海里。葡萄牙商人驾驶载重量高达600~1600吨的大帆船和园形船结成舰队从里斯本、果阿等地出发航行到澳门,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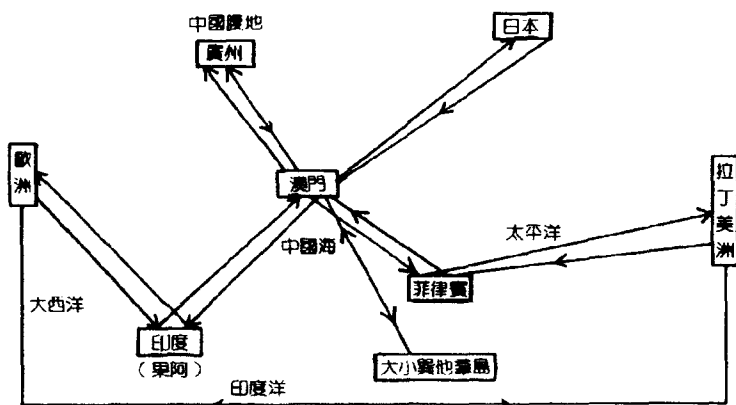


图 1.1 澳门与全球进行海路贸易的主要航线

经广州转运到澳门的中国货品运返欧洲，主要是丝、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品以及漆品、陶瓷器等，又由欧洲经果阿将毛织品、绯衣、玻璃精制品、钟表、葡萄牙酒以及沿途采购的香料、宝石、檀香、胡椒、白银等运往澳门。^⑥

其次开通的是澳门——日本长崎航线。明嘉靖年间，明朝政府鉴于“倭寇祸烈”，严禁中日通商贸易，使得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得以扮演中介角色，开拓出澳门——日本长崎航线贸易。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即驾驶大帆船乘着西南季风东渡日本，将生丝、绸缎等中国货品运往长崎，然后待秋季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运回日本的白银、土特产等。^⑦

另一条航线是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这是中国与美洲贸易的最早航线。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以及华商，将生丝、绸缎等中国货物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商人将中国丝货和少量菲律宾产物运到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地，将拉美丰富的白银运回欧洲，然后再运到澳门，购买中国的丝货和其他商品，从而构成了以中国的丝货和世界各地的白银为大宗交

易的国际海上丝路大循环。^⑧

转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使澳门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大批外商、传教士纷纷涌入澳门,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物和教堂到处耸立,“高栋飞甍,栉比相望”。据 1635 年西方记者对澳门的报道:“那是东方数一的商埠,各种货品都从该地吞吐,那里有各种宝贵的货品,也有较多财主居住该地。”1640 年加丁神父亦这样描述:“澳门的建筑皆很优美,而且商业发达,交通频繁,居民也斯文有礼。在远东商业最盛,有各种商品贩卖,金、银、丝、珠、宝石以及各种药品、香料、香水,运自中国、日本东京等地,尤其是东方为首的教友区域。”^⑨

澳门自 1535 年埠以后,在其后的 100 年间一跃而成为远东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澳门地处中国沿海的南部,是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的前哨,地处东南季候风方向,这对当时以木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海上贸易极为有利,凡从西面来的船只,均需先抵达澳门,再向东行,地理位置优越。

其次,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丝绸、陶瓷等多种手工业的崛起,为前往中国通商的各国商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货品。而当时,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嘉靖年间,又以“倭寇猖獗”为由撤销闽浙两市舶司,广州市舶司亦迁移到澳门。这种形势客观上刺激了澳门转口贸易的发展。

再次,当时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凭藉着海上强国的优势,控制着从里斯本、果阿、澳门到日本的整个东西方航道,这亦极大地推动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东西方贸易的发展。

□澳门转口贸易的停滞和衰落

然而,明朝末年,澳门繁盛的转口贸易开始显露出停滞甚至衰微的端倪。本来,葡萄牙商人已获准每年两次到广州贸易,在缴纳

货税方面亦得到明朝政府的优惠,比其他国家低 $\frac{2}{3}$,但葡商经常偷漏货税,公开走私,结果于 1631 年被停止到广州贸易,1640 年崇祯皇帝正式颁布这一禁令。

这一时期,葡萄牙国力开始衰退,其在海上的霸权先后遭到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后起之秀的挑战。1631 年,荷兰人攻占了马六甲,并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印度果阿,切断了澳门经印度果阿——欧洲的航线。1639 年,日本德川幕府因葡萄牙人牵涉到日本基督教叛乱事件之中,宣布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1641 年,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由合而分,停止了澳门——马尼拉的贸易。多种因素冲击之下,澳门繁盛的转口贸易开始从巅峰滑落。

清建立初期,仍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顺治年间,清政府为防犯汉人反抗,严禁人民出海,又“禁佛郎机(即葡萄牙)人不许入广东省会,荷兰之人贡者亦只令在馆贸易”,当时只剩澳门一地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使澳门得以继续独揽对外通商权利。尽管如此,澳门的转口贸易已大不如前。

1685 年,清政府平定台湾,为了充实兵饷及有益边海民生,遂开设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口岸对外通商,并减免关税以示“怀远”,澳门遂失去沿海贸易的垄断地位。但到 1717 年,清政府又禁止商船往南洋贸易,而澳门葡商则不受此限,澳门的贸易又恢复兴旺,贸易关税达 2 万两白银。当时,中美初期的贸易亦多经澳门转运,美国开往中国的第一艘船只“中国皇后”号也是经澳门进入中国。^⑩

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仍然是欧美外商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近代西方对东方的贸易垄断机构亦大都以澳门为据点。例如在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显赫一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怡和洋行等,均曾在澳门开设分公司或作为总部所在地。东印度公司至今仍在澳门有多处遗址,包括高楼街风顺堂附近的十六柱、今日东方基金会现址等。怡和洋行亦曾在鸦片战争期间将公司总部从广州迁往澳